

# 拉达克王国 :公元 950-1842 年(五)

## ——拉达克力量的衰退

[意]L·伯戴克 著

扎 洛<sup>1</sup> 译 , 彭陟焱<sup>2</sup> 校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本文论述了 17 世纪下半叶拉达克王国在来自喀什噶尔的突厥人和来自卫藏的蒙古 - 西藏军队的双重打击下, 逐步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从而结束了拉达克王国作为喜马拉雅地区重要力量的角色。

**关键词:** 拉达克 莫卧儿帝国 西藏 冲突

**中图分类号:** K2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09)06-0017-11

森格南杰去世之后的继任问题并未得到及时解决, 看起来在其后的数年间孀居的王后格桑(Bskal-bzang)一直担任着她的三个儿子的摄政者的角色。有时她被冠以“萨炯旺姆(sa-skyong-bawidbang-mo)”的尊号,<sup>[1]</sup>有“女保护人”之意。我们还发现有“嘉姆色伦杰(rgyal-mo sras blon)”这样的表述, 意思是“王后及诸子、众臣”等。我们还颇为突然地遇到了旧臣阿姑噶莫(A-gu vgar-mo), 直到此时他才仅在碑(题)文中被提到。而在传记中他的名字一直被拼写为“A-khu vgar-mo rje-blon”, 这可能暗示着他是王后的叔叔(a-khu)。

为先王建一座新的寺院以示追悼(dgongs-rdzogs)是最早的举措之一。选址问题需经深思熟虑。由于种种原因, 在排除了列城、巴郭和达纳(Stag-sna)之后, 决定将其建在奇姆日(Chimri 《拉达克王统史》中作 Ice-vbre 《达仓热巴传》中作 Ce-khri)。1644 年 3 月达仓热巴举行了主殿(gtsug-lag-khang)的奠基仪式。1645 年 3 月 30 日或 1646 年 4 月 18 日竣工<sup>[2]</sup>。

尽管年岁已高, 但是达仓热巴在其他领域中的活动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持续不减。这突出地反映在他继续向卫藏地区派出奢华的使团。1643 年, 他

派遣使团前往德钦曲阔寺<sup>[3]</sup>。1645 年, 他又派出一个更大的使团, 由以竹巴多杰(Vbrug-pa-rdo-rje)为首的赫尔密寺代表, 以图丹拉旺(Thub-bstan-lha-dbang)和阿库贡却(A-khudkon-mchog)为首的拉达克王廷代表组成<sup>[4]</sup>。这次出访也是为了安排森格南杰的超荐仪式, 但是使团行进颇为延宕, 一直拖延到 1646 年新年祈愿法会(smon-lam)时才到拉萨<sup>[5]</sup>。

在王后 - 摄政的要求下, 达仓热巴于 1647 年 2 月在协嘎尔(Shel-dkar/Sheh)宫主持了主佛堂的奠基仪式<sup>[6]</sup>。

1647 年下半年, 拉达克遭到了来自喀什噶尔(Kashgaria)的突厥人(Turki/Hor)的武力侵扰。他们到达嘉(Rgya)地, 并在乌希(U-shi)峡谷与拉达克的军队发生了小小的冲突。由巴巴克伯克(Babak Beg/Bha-bag-bhi)和萨拉伯克(Sara Beg/Sa-ra-bhi)率领的军队到达了曲雪雄(Chu-shod-gzhung), 在那里再次交锋, 导致很多人伤亡和大面积的破坏。在拉达克诸王子的请求下, 达仓热巴派使者前往突厥人的营地, 带了两个敌方官员回来与住持(达仓热巴? ——译者)谈判。他们说突袭是因为他们的大臣(blon-che)赞达克

[收稿日期] 2009-11-10

[作者简介] 扎洛(1969- ) 男, 藏族, 青海兴海人,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所长助理, 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与文化。

\* 由于印刷原因, 我们将“t 下点”表示为[t] , h 下点“表示为[h] , 特此说明。

汗(Zandaq Khan/Zang-dags Khan)受到侮辱而进行的报复。随后双方达成协议,传记中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图景:突厥人以穆斯林称号“辟尔(*Pir*,导师、长老—译者)”称呼喇嘛。他们的统治者是叶尔羌汗(Yar-kyen Khan)。最后他们接受了所谓的礼物——十五匹马而撤离<sup>[7]</sup>。

现在该是解决王朝问题的时候了。1647年2月15日,王国所有的贵族和官员都被招集在一个庄严的大厅里。三个兄弟都被推尊为国王,但是长子是最高的统治者。王国被他们分割开来。因陀罗菩提(Indrabodhi)也叫因陀罗南杰(Indra-rnam-rgyal)获得了“古格的农村、牧区和谷地(Bod-vbrog-rong-gsum)”<sup>[8]</sup>。德确南杰(Bde-mchog-rnam-rgyal)获得了桑噶尔(Zangs-dkar)和司丕底(Spiti)。将玛卓(Ma-spro)、宜古(Dbyi-gu)和布让(Pu-rangs)分给了孀居的王后,作为她的私人领地。所有阿里三围(Mngav-ris-skor-gsum)的剩余地区,上、下拉达克的主要地区都分给了德丹南杰(Bde-Idan-rnam-rgyal)<sup>[9]</sup>。

在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达仓热巴全身投入到协噶尔拉钦神殿(*Lha-chen gtsug-lag-khang*)的结尾工程中,在德丹南杰和因陀罗南杰的支持下工程顺利完工并如期举行开光仪式<sup>[10]</sup>。1649年,他受因陀罗南杰之邀前往古格,在那里他朝拜了托林寺(Mtho-Iding)。那时国家再次受到霍尔人(突厥?莫卧儿?)军队的威胁,他在那里接见了两个霍尔人的使者。在他返回赫尔密寺后,接受了由西藏和硕特首领固始汗派来的扎西通门巴(Bkra-shis-mthong-smon-pa,也许是一个喇嘛)和蒙古宰桑(Mongol jaisang)的拜访,结果两个政府之间达成了谅解<sup>[11]</sup>。

老王后格桑在她的晚年似乎变得相当活跃。1649年她向卫藏地区派去一个以图丹拉旺(Thub-bstan-lha-dbang)、阿库桑噶(A-khu bzang-dgav)、扎西多杰(Bkra-shis-rdo-rje)为首的王廷代表和以仁钦班觉(Rin-chen-dpal-vbyor)释迦达沃(shākya-zla-vod)为首的赫尔密寺代表组成的使团。他们为已经在1646年去世的阿库噶莫(A-khu vgar-mo)举行超荐仪式。<sup>[12]</sup>1650年,王后不听其尊师的劝告到冈底斯山(Kailasa)旅行,结果,她在桑噶尔病倒了,在桑拉(Bzang-la)故去。她的遗体被运到谢噶尔,并在那里举行了葬礼<sup>[13]</sup>。

1650年,达仓热巴也派出了以奥洛·阿旺德勒(O-lo Ngag-dbang-bde-legs)为首的最后一个使团,分别拜访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竹钦活佛以及德钦曲阔寺。该使团解决了每年向卫藏派遣年轻僧人的细节问题,拉萨政府与竹巴(Vbrug-pa)之间曾因该问题而发生了争议<sup>[14]</sup>。

达仓热巴现在已经76岁高龄了,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为自己的葬礼做了必要的安排之

后,于1651年1月29日在赫尔密寺辞世<sup>[15]</sup>。葬礼仪式规模宏大,五个指定的僧人在他的遗骸旁为其诵经<sup>[16]</sup>。1655年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悼仪式,国王和他的兄弟们也亲自出席<sup>[17]</sup>。按照国王德丹南杰的要求,僧人阿旺(Ngag-dbang)、贡噶伦珠(Kun-dgav-lhun-grub)、图丹格勒迺(Thub-bstan-dge-legs-vbyung-gnas)、索南坚赞贝桑布(Bsod-nams-rgyal-mtshan-dpal-bzang-po)为达仓热巴撰写传记,并于1663年6月完成<sup>[18]</sup>。

达仓热巴的去世留下了一段难以填补的空挡。尽管他的转世灵童阿旺措吉多杰(Ngag-dbang mtsho-skyes-rdo-rje)如期在拉达克南部发现<sup>[19]</sup>,但是他从没有产生过任何重大影响,而且他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在《拉达克王统史》中出现过。他唯一起作用的一次(地位颇低)是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在1684年与西藏签订条约的时候,但是那时他仅仅是一个孩子,而国王的上师(*dbu-bla*)一职仍然空缺。的确,在达仓热巴去世前夕留下的训示之一就是要求噶尔(Dgar/Sgar)<sup>[20]</sup>和德钦曲阔寺把达波喇嘛(Bdag-po bla-ma)(?)和措那曲杰(mtsho-sna chos-rje)<sup>[21]</sup>送到拉达克。事实上,1650年的使团已经将此事告知两位竹巴派的领袖<sup>[22]</sup>。

但是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达仓热巴生前与格鲁派寺院的关系相当不错,后来逐渐恶化,进而演变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在拉达克和古格对待格鲁派的态度以及在达赖喇嘛的辖区内对待竹巴派的态度,两个团体都感觉受到了统治力量的歧视。所以这一问题也需要讨论。1652年或稍晚些,噶尔派囊索拉旺旺秋(*nang-so Lha-dbang-phyug*)、德钦曲阔寺派联合管理者(*gnyer-zla*)释迦祖楚(shākya-rdzu-vphrul)前去调查详情<sup>[23]</sup>。正在此时,国王分别给竹钦活佛和达赖喇嘛写信以寻求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竹巴派学者担任他的宗教上师。至于格鲁派的地位,国王提议平等对待两个教派,这就意味着这两个教派在两方都享有同等的福利<sup>[24]</sup>。囊索发现群则奥洛·阿旺德勒于1651年从西藏返回后,强烈地鼓吹支持噶尔,赫尔密寺官员也是这样,致使紧张气氛骤然升起。后来,他向拉萨写信,建议满足国王的要求<sup>[25]</sup>。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往内地(1652年4月),德钦曲阔寺经师为了上述目的到拉萨为他送行。囊索的信件被转到了摄政索南热丹(Bsod-nams-rab-brtan)手里,他将信转给了经师。噶尔的强佐珠却(*phyag-mdzod grub-cog*)也来到拉萨讨论此事。最后珠却和香·扎西孜巴(Shangs bkra-shis-rtse-pa)代表政府前往拉达克。他们要求国王赐予古格达波(即古老的王族家庭)一座城堡和适当的领地,另赐领地以支持格鲁派。这些要求(至少部分)得到了满足,因此使团于1645年返回

之后,经师提议派珠旺活佛(Grub-dbang rin-po-che)去做国王的上师,然而这并非已故达仓热巴的遗愿。有一僧人曾经讥笑道,珠旺在乎的是金子,他的弟子则喜欢美酒<sup>[26]</sup>。我们很难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因为珠旺(Grub-dbang)在噶举派中是个很常用的称号<sup>[27]</sup>。

于是,第五世竹钦活佛巴散旺波(Dpag-bsam-dbang-po)的一个学生本洛珠旺活佛(dpon-slob Grub-dbang Rin-po-che)于1655年被派往拉达克,西藏政府为他的旅程提供了所有必需品。此时达赖喇嘛已经回到拉萨,正式接见了竹钦活佛和经师,同时给予珠旺神秘加持,珠旺便立刻出发开始了他的旅程<sup>[28]</sup>。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一事件如同其他许多事件一样显示竹巴派和格鲁派经常采取共同行动。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竹钦活佛和经师每年都在拉萨参加新年祈愿大法会(smon-lam)。

另外,这种对竹巴派增加的热忱也许与法王穆增巴(chos-rje Smu-rdzing-pa)与国王森格南杰时代给予达纳寺(Stag-sna monastery)的特权、豁免权与领地(在冈底斯山以及古格、桑噶尔、拉合尔等地)在此时获得国王的更新确认有关。确认文告于1661年8月签署。<sup>[29]</sup>

然而,珠旺活佛在拉达克的活动颇为短暂。1661年末,拉达克国王派遣管家仲措巴(gnyer-pa Grong-vtsho-ba)到拉萨为已故的珠旺活佛送去超度祭品。与这位管家同行的有大臣阿觉奇古(blon-po A-jo-khyi-gu)和顿珠佩(Don-grub-vphel)<sup>[30]</sup>,实际是个政治使团。他们提醒拉萨政府,当香·扎西孜巴访问拉达克时,国王曾向他许诺将公平对待阿里的格鲁派,他遵守了诺言。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回报,如果卫藏地区的竹巴派未能得到同样友好的对待,那么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这一问题被提交给政府,于是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往拉达克,使团由代表政府的萨南比丘(Sa-nam dge-slong),代表竹钦活佛的嘉协蔡寺仲聂嘉木样坚赞(Rgyal-byed-tshal dkon-gnyer vjam-dbyangs-rgyal-mtshan),代表荣增的一个俗官组成,他们向德丹南杰保证所有卫藏地区的竹巴派会得到拉萨当局最大的关照<sup>[31]</sup>。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拉达克和卫藏地区的竹巴派之间也发生了摩擦。一个不守规矩的赫尔密寺僧人从咱日(Tsari)朝山回来,途中在冈底斯山地区滞留,探访当地的苦行者(Gangs-ri-ras-pa),他们对拉达克的竹巴派僧人进行了侮辱性的评论。赫尔密寺僧人康巴(Khams-pa)给国王呈送了有关此事的信件。信被转递到了拉萨摄政王的手里,他将此事交给噶尔和经师讨论并做出决定。于是派遣赛尔林喇嘛(Gser-gling bla-ma),在噶尔的仲聂嘉木样坚

赞和管家多杰曲桑(Rdo-rje-chos-bzang)的陪同下,前去审讯那些苦行者。他们带着一个典故回来,该典故的意思是说“诽谤了我们,还把国王蒙在鼓里”<sup>[32]</sup>。

1664年国王再次派阿库奇古(A-khu khyi-gu)前往拉萨处理这一事件,嘉木样坚赞的报告并不很令人满意,而经师坚持和睦相处的必要性,并强调卫藏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竹巴派之间应该抱有善意。最终西藏政府委派错那栋群则(Mtsho-sna-gdong chos-mszad),由丹增竹杰(Bstan-vdzin-vbrug-rgyas)和来自噶尔的赤列热杰(Vphrin-las rab-rgyas)陪同,跟随阿库奇古(去拉达克?)去寻求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拉达克方面派赫尔密寺的图丹赤列(Thub-bstan-vphrin-las)出面接见,而卫藏地区的使者则将印版的《达仓热巴道歌集》、全套的《白玛噶波文集》赠送给了图丹赤列。争吵最终获得了友善的结局<sup>[33]</sup>。

事实上,那时德丹南杰还有比僧人们争吵更令人担心的严重问题。如上所述,在喀尔布(Mkhar-bu)战役之后,国王森格南杰承诺向莫卧儿进贡。然而,从未缴纳过贡品,从各方面来说拉达克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但是在1663年,当新皇帝奥朗则布开始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克什米尔旅行时<sup>[34]</sup>,拉达克王向他派出了一位使臣,也许他对边境上出现这样一位有合适的理由对拉达克心怀不满且有办法强迫赔偿的统治者感到不安。使者们受到皇帝的接见,向皇帝重申拉达克王效忠和上贡的誓言。承诺将营建一座清真寺、以皇帝的名字念诵“呼图白(khutba,伊斯兰教宣教仪式—译者)”,在钱币上铸印皇帝的名字。那时在莫卧儿宫廷的法国人弗朗索瓦·伯尼尔(François Bernier)曾看到这些使臣并与他们交谈。我们也因为他才获得了有关此事件有价值的片段信息。应当指出这个使团并非自发的表示,事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伯尼尔提到只是因为明确的入侵威胁才使拉达克王屈服<sup>[35]</sup>。

当奥朗则布离开克什米尔时,德丹南杰显然认为自己合理地仿效了父亲在1639年之后的行为方式,又一次漠视了莫卧儿人的要求。但是奥朗则布并非无足轻重,特别是涉及宗教事务时,比容易相处的沙贾汗(Shah Jahan)要严苛得多。两年后,克什米尔统治者赛义夫汗(Saif Khan)向拉达克国王派去一名使者,授予他“大西藏的柴明达尔(zamindār of the Great Tibet)的头衔,称其名为“Daldan Namjal”,是德丹南杰(bDe-Idan-rnam-rgyal)的一个准确转写。使者穆罕默德·沙非(Muhammad Shafi)作为携带皇家法尔曼(farmān,命令、法令—译者)之人,要求拉达克王接受莫卧儿的宗主权和伊斯兰教,并威胁他如果拒绝将会遭到帝国军队的入侵。很明显抵



制是不明智的,所以德丹南杰对此只好欣然顺从。国王和高级官员们在距离列城六公里之外迎接穆罕默德·沙非。他们以尊敬之心接受了帝国的所有文件,并立即答应了所有的要求。据载,以奥朗则布的名字诵读“呼图白”,清真寺奠基,拉达克政府向民众传播伊斯兰教。使者带着 1000 阿什拉非(ashrafis)即 2000 卢比和许多珍贵物品荣归克什米尔。拉达克问题解决的消息于奥朗则布统治第 8 年的主马达·阿黑赖月第 11 天(11th Jum'ada ul-Ākhira)即 1665 年 12 月 19 日(西历)传到了帝国宫廷。<sup>[36]</sup>

尽管我们的资料并未提及,但我们可以猜想在这一时期国王延续了自 1639 年以来对克什米尔贸易采取的毁灭性的封锁政策,这对国家的商业利益造成严重的冲击。

穆罕默德·沙非使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后盾。博学的后代学者穆罕默德·阿扎姆(Muhammad Azam)甚至称之为“征服大西藏”<sup>[37]</sup>。这纯属夸大之辞。公正而论,奥朗则布的“法尔曼”可能强调通过在克什米尔边境展示武力,以及靠斯卡尔杜(Skardo)的首领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实现其目的。克什米尔自 1637 年以来即成为莫卧儿皇帝的忠实臣民,负责监督拉达克的那些不信教者,他们与这些不信教者总是关系糟糕。在此期间,斯卡尔杜的国王是穆拉德汗(Murad Khan),他是拉菲汗(Rafi Khan)的儿子、穆罕默德·穆拉德(Muhammad Murad)的孙子,他在 1637 年帮助过莫卧儿人<sup>[38]</sup>。《阿拉姆基尔(即奥朗则布)本纪》(‘Ālamgīr-nāma)告诉我们他在这一时期因为出色的服务而受到奖励,被授予荣誉袍(khil‘at)。巴尔蒂人(Balti)甚至伪称在虚弱的继承人阿里·米尔(Ali Mir)的统治下他们失去了拉达克,而穆拉德汗重新占领了拉达克<sup>[39]</sup>。或许他被委任作为帝国在拉达克的利益和权力的代表。

接受拉达克投降的事实是受一封由奥朗则布于其统治的第 8 年(大概在 1666 年初)发给“德丹(Deldan)”(即 Bde-Idan-rnam-rgyal)的哈里答(kharī[t]a,官方信件)的暗示。它确认了三个主要条件:诵读呼图白、铸造货币、营建一座清真寺<sup>[40]</sup>。我们不知道当时是否真的铸造了货币,无论如何,没有实物留传到今天。今天仍耸立于列城的清真寺,是一个简朴的建筑,它是由谢赫·穆迪丁(Shaikh Muhi ud-din)于伊斯兰历 1077 年(1666 年 7 月)建造的<sup>[41]</sup>。一封表示效忠的信件通过赛义夫汗送到皇帝那里,奥朗则布通过另一个哈里答予以回复,并授予其荣誉袍(第 9 年,即 1666 年 7 月)<sup>[42]</sup>。

我们不知道此前伊斯兰教在拉达克的地位如何,可以肯定生意人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是西藏西部的传统似乎是对伊斯兰教保持警惕性的

控制,甚至有些敌意,1625 年古格的末代国王甚至捣毁了一座清真寺<sup>[43]</sup>。

对莫卧儿宗主权的认可很可能削弱了拉达克与达赖喇嘛及其政府的关系。无论如何,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竹巴派和格鲁派之间也相互冷淡,在那几年里,竹钦活佛和荣增仁波切(Yongs-vdzin Rin-po-che)都不曾访问过拉萨。1667 年德丹南杰,由于对派低能的其古(Khyi-gu)负责上一个使团感到懊悔,同时还担心竹巴派内部的分歧,故而又派赤色和白图(Dpe-thub)的确细巴(mchod-gzhis-pa,寺庙属庄园的管理者)前往拉萨。他们被当作粗鄙的乡村野夫而被轻蔑对待。“阿里国王的使者们表面上看起来与普通的朝圣者相似,他们只是屈尊和自贬身份。使团成员之一被授予圣职,其他成员授予居士戒”<sup>[44]</sup>。难怪到 1669 年,德丹南杰发现应该把诺诺杰(No-no rgyal)这一具有高阶身份的贵族派往拉萨。诺诺杰负责抚平阿里地区格鲁派的怨言,因为竹巴派没有为他们提供燃供灯所需的酥油,他们似乎负有这样的义务,达赖喇嘛拒绝介入此事,因此,这一事件可能就是诺诺杰用某种方法自己解决的。诺诺杰由定本白雅(lding-dpon dpal-yag)陪同,后者可能是一位拉达克的官员。阿里的格鲁派再次提出抱怨,因为尽管在白雅管辖区内的驿站是由格鲁派建立的,但是却不允许他们为了维护驿站而旅行。没有资料显示这一抗议是如何解决的<sup>[45]</sup>。

该使团似乎比前一个要成功一些,短期内没有其他的危机发生。1672 年赤色的住持达杰南杰(Dar-rgyas-rnam-rgyal)受到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接见,并委托他为国王德丹南杰带一封信<sup>[46]</sup>。

与拉萨关系的暂时缓和鼓励了国王利用释迦嘉措(Shakya-rgya-mtsho)的效力在西部边境采取进击性的策略。这就导引我们进入新的场景即一个男人注定要在未来岁月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属于萨布(Sa-bu)家族,是森格南杰的大臣阿古噶嫫(A-gu vgar-mo)的孙子。1646 年阿古噶嫫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曲尼多杰(Chos-nyid-rdo-rje)继任成为萨布噶伦(Sa-bu bkav-blon)(不是主要首相)。国王德丹南杰垂涎于他妻子的美色,试图在他进王宫时派一名侍者将其杀害,他逃过了那一劫,但是在返回萨布的途中被他自己的管家杀死。当国王正在筹备婚礼时,那位遗孀却逃到了宜古(Db yi-gu)削发为尼,以此来抵制这个婚姻。僧侣集团也介入此事,国王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此事招致很多人的不满,国王只好以塑神像、建嘛呢墙等方式向那位被害的无辜大臣赎罪<sup>[47]</sup>。被害人的儿子释迦嘉措被指定继承其父亲的官职(尽管他还很年轻)而成为首相,并官任此职延续到尼玛南杰(Nyi-ma-rnam-rgyal)时期。他的领地是宜古,而不再是萨布,萨布落入其家

族内的另一个分支之手。晚些时候,我们发现释迦嘉措的侄子贡噶平措(Kun-dgav-phun-tshogs)拥有该地<sup>[48]</sup>。

释迦嘉措被指定为军队首领后,即于1673年侵犯下拉达克(Lower Ladakh)和普里格地区的首领。1674年,拉达克的活动延伸到巴尔蒂斯坦,占领了喀普路(Kha-pu-lu)和却尔白(Chor-vbad),把第一任领导权授予哈提姆汗(Hatim Khan),第二任是苏丹汗(Sultan Khan)。当然,这样的前进政策使莫卧儿的利益范围受到影响,由于斯卡尔杜统治者的要求,克什米尔政府向下普里格派遣一支小军队,然而被拉达克的大臣竹南杰(vbrug-rnam-rgyal)(其他未知)制止而被迫撤军<sup>[49]</sup>。

之后不久,德丹南杰就派释迦嘉措前去帮助他的外公和舅舅,即洛沃曼塘(Glo-bo sman-thang)的统治者(现代尼泊尔的木斯塘/Mustang)。释迦嘉措征服了洛沃的噶宗(Skag-rdzong/现代的Kagbeni),并对王国整个东部地区的土匪行为进行镇压<sup>[50]</sup>。随后资料告诉我们:“当纳瓦布·易卜拉欣汗(Nawab Ibrahim Khan)控制下的克什米尔人和铁木尔·伯克(Timur Beg)带着他们的霍尔(莫卧儿)军队出现在普里格时,释迦嘉措利用聪敏智慧的方法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抵挡回去,于是出现一个繁荣的时期”<sup>[51]</sup>。除非《拉达克王统史》中的日期出现错误,否则这场战役不应发生在1673年和1674年,因为那时易卜拉欣汗(Ibrahim Khan)还不是克什米尔的执政者。这不太可能发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1662-1664),因此,这场战争肯定是在他第二个任期的前期(1678-1685)。

德丹南杰在几个文献中(比如F.57,59-65,106)都曾提到过,但是其中找不到什么太重要的信息。

在他正式登基前,首相由阿古噶嫫担任,他从森格南杰时期即任职就事(F.57),但是到1646年就去世了<sup>[52]</sup>。他的继任者是曲伦钦波·觉巴嘉措(chos-blon chen-po vbyor-ba-rgya-mtsho),他在题文(F.65,188)中被提到。1658年,国王为了奖励巴郭的顿珠佩(Don-grub-vphel)在他们前往喀普路和喀布的途中提供伏马帮助而写的一封感谢信中,称他为“雪巴布(zhu-ba-po)”<sup>[53]</sup>。1679年,当蒙古-西藏军队进攻时,觉巴嘉措仍然健在并执掌政局<sup>[54]</sup>。释迦嘉措在1673和1674年时还不是首相,但随后可能就被任命了。另一位显贵人物是囊伦贡噶坚赞(nang-blon Kun-dgav-rgyal-mtshan)<sup>[55]</sup>。

德丹南杰有三个妻子。他先娶了贡宗姆(Kun-vdzom),这在F.65中被提到,到德勒南杰(Bde-legs-rnam-rgyal)时代仍然在世<sup>[56]</sup>。第二位王后是贝孜(Dpal-mdzes),同样到德勒南杰时代仍然健在,并于1696年到扎什伦布寺朝佛,请班禅为她

讲经<sup>[57]</sup>。在国王向莫卧儿人投降后,他又娶了布赤杰姆(Bu-khrid rgyal-mo)<sup>[58]</sup>。在一份跋文中这三位王后同时出现<sup>[59]</sup>。

国王的大儿子是德勒南杰,他出生于1650年,达仓热巴应其父之请为他取了名字<sup>[60]</sup>。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拉达克王统史》写本及各种碑文都只提到他的名字。然而,事实上,国王的一个偏妃(yum chung-ba,似乎就是布赤)后来又为他生了另外三个儿子:阿旺朋措南杰(Ngag-dbang-phun-tshogs-rnam-rgyal)、久哲南杰(vjig-bral-rnam-rgyal)和图丹南杰(Thub-bstan-rnam-rgyal)<sup>[61]</sup>,这些王子们要比他们的哥哥德勒南杰小15-20岁。他们中的老大成为拉达克格鲁派寺院的主持,并在宗教政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像我们随后将看到的那样。老二久哲南杰于1683年作为人质被送到克什米尔。老三的情况我们无从知晓。

大约在1675-1678年间,国王将国家的事务委托给了他的大儿子,尽管他还是名义上的统治者<sup>[62]</sup>。他活了很大岁数,大约在1694年去世,因为在纪年为(1694年)4月28日(即西历6月21日)的一首诗中报告了他亡故的讯息<sup>[63]</sup>。此外,奥朗则布的一个哈里答<sup>khari[t]a</sup>,在其统治的第39年的主马达·阿黑赖月第3天(1696年1月9日)曾说“已经得知尼玛南杰王(Rāja nyi-ma-rnam-rgyal,德勒南杰的儿子和继承人)的祖父阿乞巴特·马合木汗(Rāja ‘Āqibat Ma[h]mūd Khān)死亡的消息,国王很乐意授予荣誉袍和曼萨卜(mansab)的头衔”<sup>[64]</sup>。这样,国王德丹南杰比他的儿子多活了大约三年。

德勒南杰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国王也许有过深刻的质疑。《拉达克王统史》显然没有给他王的头衔,目前已知的碑(题)文也同样,他始终是一个与父亲相关联的王子<sup>[65]</sup>。此外,莫卧儿和卫藏的文獻也一致地忽略了他,在与古格战争相关的记载中也只提到了德丹南杰。这些似乎证明他是代表或协助其父处理王国政事,而非出于自己的权利。

促使他上台的决定性事件是发生在拉达克、西藏和莫卧儿帝国之间的三角冲突,它导致拉达克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短命统治的结束,以致它的疆界缩减到现在的样子。有关此事已有两篇论文进行了充分的讨论<sup>[66]</sup>。此处,我将限定自己只对冲突的概况和致使冲突结束的协约进行描述,同时增补一些曾被遗漏的信息片段。

西藏方面认为这场战争是因为拉达克王对格鲁派的敌意日益增加,以及洛沃人和日土人对西藏萨噶(Sa-dgav)和卓雪(Gro-shod)地区的劫掠所造成的<sup>[67]</sup>。此前我们已描述过拉达克和拉萨的关系是何等的紧张。另一个文献资料显示,森格南杰曾公平地保护所有教派并避免在新获取的古格领土上干涉格鲁派,而德丹南杰却把托丁寺的僧众额数限



制为三十人<sup>[68]</sup>。与拉萨存在纷争的南竹巴派(Lho vbrug, 布鲁克巴)为这场战争提供了导火索,拉达克王作为所有竹巴派支系的支持者,“向西藏发信并申明他将帮助(布鲁克巴的竹巴派首领)”<sup>[69]</sup>。这涉及达赖喇嘛政府于1676年发动的战争,西藏的军队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感谢萨迦寺住持和班禅的管家(强佐——译者)的调解,终于在1678年达成和解协议<sup>[70]</sup>。1677年拉达克意在干涉的荒谬企图可能加速了和解协议的达成,这才允许西藏将其全部的军队转而派往拉达克。

发动战争是达赖喇嘛自己做出的决定,并没有征得施主和保护者和硕特汗王的同意,尽管和硕特汗王负责抵御外侮。战争的行动委托一个来自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噶丹次旺巴桑(Dgav-ldan-tshe-dbang-dpal-bzang)负责指挥,他出生于洪台吉(Hungtaiji)家族,是一个准噶尔(Dsungar)王子。他在寺院里有一份显赫的职业,1662年,第一世班禅(即第四世班禅——译者)去世时,负责维持那里的市场秩序。他全力以赴,执法极严<sup>[71]</sup>。1678年8月初8日(西历9月23日),他在拉萨,达赖喇嘛为其向包括(念青)唐拉(thang-lha)、纳木错(Gnam-mtsho, 腾格里湖)等北方守护神(yul-lha gzhi-bdag)祈祷并献祭。8月14(西历9月29日)他带着礼物谒见达赖喇嘛。另一次拜见是在8月20日(西历10月5日)。8月25日(西历10月10日)他去了达木(Vdam)<sup>[72]</sup>。1679年他再一次到拉萨,恳求紧急介入抵抗拉达克,以挽救黄教派在西藏西部地区的处境。摄政罗桑金巴(Blo-bzang-sbyin-pa)反对这个提议,并成功地暂时阻止了他。但是在他离职之后,继任者桑结嘉措(Sangs-rgyas-rgya-mtsho)执政之前不久,达赖喇嘛决定发动战争,1679年5月28日(西历7月7日),噶丹次旺正式接到出征命令<sup>[73]</sup>。

起初,他的军队只有250个人,大多是蒙古骑兵。但是,他从萨噶地区的统治者绰沃噶波(Khro-bo-dkar-po)和阿松(A-gsum)那里得到了充足的供应、装备和援兵<sup>[74]</sup>。当他刚到所获得的领地冈底斯山-玛旁雍措湖地区,便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巴沙尔王(Raja of Bashahr)凯哈里·辛格(Ke-hari Singh)以提供军事协助换取贸易便利<sup>[75]</sup>。

与此同时,释迦嘉措率领拉达克军队向东进军<sup>[76]</sup>。双方在一个叫热拉喀玛(Ra-la mkhar-dmar)、也就是地图上的Rala-jung地方交战,该地处于印度河上游两个支流的交汇点扎西岗(Bkra-shis-sgang)附近的荒原上,大致在东经79°45',北纬32°27'<sup>[77]</sup>。拉达克军队遭到重创,被追击远遁至隆空(Lung-khung),即近代拉达克-西藏的边境一线,他们在那里重新集结以做困兽之斗。另一部分被击溃的军队躲进了达拉喀(Stag-la-mkhar/Tak-lakoth)、札布让(Rtsa-brang/Tsaparang)和扎西岗

(Bkra-shis-sgang)/Tashigang)的城堡之中。这些事件应该发生的1679年秋季,因为消息于12月初1日(西历1680年1月2日)前传到拉萨<sup>[78]</sup>。

这场战争并无决定性的意义。双方军力很小,几同先遣部队,除了包围城堡外,蒙古军队对其无能为力。但是,此时拉萨政府派出强大的援军即大约5000人的兵力,这使西藏军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古格城堡里的拉达克守军未等遭受攻击就投降了<sup>[79]</sup>。这一胜利的消息可能是从3月23日(西历1680年4月22日)到达拉萨的噶丹次旺的信使那里得到的<sup>[80]</sup>。

在沿着印度河方向进行了道路勘察之后,噶丹次旺更倾向于从日土方向做迂回进军。在那里他与拉达克的主力部队相遇,对方在羌拉(Byang-la/Changla)山口之前列阵待敌。由于某种原因,蒙古将军将战场指挥权委托给了大臣(mdun-na-vdon)布琼(Bu-chung)、白玛杰波(Padma-rgyal-po)、若措仁增(Rog-tsho rig-vdzin)和蒙古官员纳木塔尔(Namtar)。战争以西藏军队的完全胜利而告终,拉达克王和他的大将释迦嘉措落荒而逃<sup>[81]</sup>。我们可以再次推测噶丹次旺的信使于7月15日(西历9月8日)到达拉萨,7月25日(西历1680年9月17日)举行仪式,期间展示了象征战争胜利的礼物<sup>[82]</sup>。

噶丹次旺继续进军,未遇任何抵抗便占领了首都列城<sup>[83]</sup>。拉达克的残余部队据守巴郭及其附近,也许就在部分地阻挡印度河谷通向小镇东南部的山脉上,西藏军队在那里与他们相持。杂乱无序的战争在那里延续了三年(1681-1683)。与此同时,国王和他的政府定居在定莫岗(Gting-mo-sgang)。

战争并不完全限于拉达克。1682年秋,噶尔夏(Dkar-sha)寺的一些喇嘛将蒙古军队带进了桑噶尔。保卫国家的任务交给了国王因陀罗菩提,显然他曾指挥过在古格的第一次抵御任务,在拉达克军队最后失败后撤退到了拉达克南部的山里。他驻扎在塔拉(Thar-la)。为了壮大自己弱小的部队,他从努底(Nyung-ti/Kulu)召集门巴(Mon)军队,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身于对立的双方之间,开始抢劫这个国家,监禁僧人和信徒,掠夺国王牧人的羊群和牦牛。最后,桑噶尔的国王和噶尔夏寺的喇嘛联合起来对抗门巴军队,致使其撤军。至于蒙古人,他们似乎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十分积极<sup>[84]</sup>。我们知道,尽管他们袭击了普代(Phug-dal)寺,但是没有占据它<sup>[85]</sup>。

巴郭的僵局最终被拉达克王打破了,他对利用自己无助的军队击退侵略者感到失望,于是请求并得到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易卜拉欣汗(1678-1685在位)的干涉。菲戴汗(Fidai Khan)率领一小部分军队穿过佐吉拉(Zoji-la)山口,进入普

里格<sup>[86]</sup>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来自巴尔蒂斯坦和从下拉达克征召的军队的增援。他们在巴郭与尼莫(snye-mo)之间的恰杰(Bya-rgyal)平原上与西藏-蒙古军队相遇,西藏军队被击败,远遁至今天边境以外的扎西岗。至于在桑噶的蒙古支队,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袭击<sup>[87]</sup>,然后就撤离了。

莫卧儿介入几个月后,国王结束了艰难的半流亡生活,为了奖赏那些表现突出的人物特签署了两份文件。第一份是在4月13日(西历1683年6月7日),应释迦嘉措的请求,在定莫岗颁给一位名叫贡却次仁(Dkon-chog-tshe-ring)的人<sup>[88]</sup>,该文件零散而不完整,因为国王的名字被遗漏,内容也并不清晰。另一份是在5月18日(西历1683年6月11日),也是在噶伦(bkav-blon)释迦嘉措的请求下,由国王德勒南杰(?)在定莫岗颁发给列城的坚赞顿珠(Rgyal-mtshan-don-grub),以感谢四位穷人(du-bag)在香孜(Shang-rtse)被蒙古军队围困期间,为其提供的帮助<sup>[89]</sup>。

对莫卧儿人而言,蒙古-西藏军队的撤退意味着战争结束,菲戴汗提交了提供援助的费用账单。条件非常苛刻。理论上拉达克应该从1664年开始交纳的进贡,实际上从未交纳过,而现在则用种类和数量进行了准确的规定,国王必须每三年向克什米尔交纳包括18匹马、18个麝香和18条白牦牛尾的贡品。作为交换,他每年得到500(或300)袋大米,以增加纳古达尔(Naushahr)的贾吉尔(jāgīr)的税收<sup>[90]</sup>,这似乎在1665年他归顺的时就同意了。德勒南杰本人必须以阿乞巴特·马合木汗的名字接受伊斯兰教。他承诺将以皇帝的名义铸造钱币<sup>[91]</sup>,维修列城的清真寺,并将他的小儿子久哲南杰作为人质送到克什米尔。最重要的是对克什米尔在羊毛出口和过境贸易方面的垄断权做出了让步,这对于以披肩加工、红花粉为主要产业的克什米尔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领土只是有一个微小的变化,将纳布萨特(Nabsat)村庄(?)可疑的拼写,未知的地点,也许在德拉斯/Dras割让给了克什米尔。这项条约签订于奥朗则布在位的第26年,这年开始于伊斯兰历1094年的斋月,即西历1683年8月<sup>[92]</sup>。确切的日期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是在1683年秋<sup>[93]</sup>。所有的条约都是以时间为限的,但是克什米尔的统治者(首先是莫卧儿,然后是阿富汗,之后是锡克)始终成功地把持着羊毛贸易的垄断权,当1812年和1820-1822年米尔·伊萨特·乌拉赫(Mir Izzet-Ullah)和莫尔克罗夫特(Moorcroft)访问拉达克时,情况仍然如此<sup>[94]</sup>。

作为条约的从属性结果,上拉合尔(Upper Lahul)在1682年被库鲁王毕迪·辛格(Bidhi Singh,1672-1688)占领,一直保留在他的手里<sup>[95]</sup>。于1673、1674年占领的普里格和巴尔蒂斯坦的广袤

地区恢复了它们先前的独立。

据有关此问题的唯一权威人士坎宁罕姆所言,在莫卧儿人离开后,噶丹次旺发动了又一次进攻,期间他摧毁了列城的城堡<sup>[96]</sup>。此事似乎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得知“博硕克图汗(Boshogtu Khan,即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派出协助部队以增援噶丹次旺的军队,国王德勒南杰和他的儿子由于无法抵挡这些前来拉达克的军队,与阿里(Mngav-ris)一同向我们投降,愿意做任何被要求的事情”<sup>[97]</sup>。

事实已很清楚,进一步的对抗毫无意义。在拉达克国王向莫卧儿投降后,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由他执掌政权)极其关注国王改宗伊斯兰教对佛教地位的实质危害。1683年秋,当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1641-1717)来拉萨时,就与之讨论过这个问题。竹钦活佛作为竹巴派的首领,想来可以对拉达克王室产生重大影响,于是桑结嘉措肯请他到拉达克访问,甚至承诺从噶丹次旺在列城获得的战利品给予他相当的奖赏。竹钦接受了这个提议<sup>[98]</sup>。

文献中未给出有关他行程的确切时间,但显然是1683-1684年冬起程的。在意贡噶尔萨(Dbyi-gong sgar-sa/Gargunsa?)他遇见了与其军队驻扎在一起的噶丹次旺,噶丹次旺同意竹钦活佛商定一份包含有使拉达克王重新改信佛教的和平条约。赫尔密寺活佛阿旺措吉多杰(Ngag-dbang mtsho-skyes-rdo-rje)也来拜访竹钦活佛,向他通报相关情形。随后竹钦活佛到顶布岗(Gting-vbur-sgang/Tingmosgang),请求两位国王答应信仰佛教,特别是信仰竹巴派和格鲁派,他以古格统治者喇嘛益西沃(Bla-ma Ye-shes-vod)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激发,喇嘛益西沃于11世纪落入葛逻禄(Qarluq)人之手,他宣布放弃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命令他的侄子用为他筹集的赎金去推进真正的宗教信仰。竹钦活佛请求国王放弃伊斯兰教,因为那种信仰将导致他们及其臣民的毁灭。他获得了完全成功,国王和大臣们宣布他们将重新信奉佛教(尽管我们知道在克什米尔统治者面前主张伊斯兰教条),于是竹钦活佛大约在1684年春季或夏季返回卫藏地区<sup>[99]</sup>。

第六世竹钦活佛的出使可能将拉达克的宗教与文化从极度危险中拯救出来,因此,他的名字在碑(题)文中备受尊敬和爱戴。赫尔密寺活佛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他而显得荣耀<sup>[100]</sup>。但是措吉多杰仍然是一个暗淡的角色,或者他一直坚持将自己局限于政界之外,从以下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朝又一次向格鲁派倾斜,至少短期如此。

第六世竹钦活佛的传记试图让我们相信他在出使过程中将自己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宗教方面。但是其他文献则提供了他代表拉萨政府签署条约的全部细节。条约内容可以做如下概括。首先介绍了



10 世纪吉德尼玛贡对领土做出的分封,正式宣布西藏是一个佛教国家而克什米尔是一个非佛教国家,两种宗教不可能和谐共处。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争吵应当被视为是过去的事情和国王之间的争执,为了保卫佛教国家与非佛教国家之间的疆界,承诺不再援引外国军队。至于贸易方面,阿里三围的山羊毛除了克什米尔之外不允许卖给任何其他国家,规定每 8 藏秤(nyags,1 藏秤 = 4 1/4 盎司)长羊毛价格为 2 两纯银(*dngrul-dmar-zog*)或 1 卢比(*rin-dngrul*,1 卢比)。(拉达克的)宫廷商人不允许进入日土。为了进行羊毛贸易,四个克什米尔商人定居白图负责与克什米尔的贸易。除了向克什米尔的运输货物,不允许克什米尔人进入羌塘(*Byang-thang*/即西藏西部)。拉达克的克什米尔居民到羌塘旅行时,不允许他们自己携带羊毛到克什米尔。根据竹钦活佛制定的章程,其中还涉及供灯和拉萨祈愿法会的开销问题,玛旁雍措湖地区的敏塞尔(*Men-ser*)飞地因此而留给了拉达克王(此飞地归属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此外,边界定在了德却(*Bde-mchog*,或译为迪穆楚克——译者)附近的拉日(*Lha-ri*)河。每年来自拉萨的政府商队(通常叫恰巴/*cha-pa*)货物应当有 200 驮的茶叶和(其他数额的)长条茶砖组成,商队只能从德却过境。而拉达克王每三年要向西藏的新年祈愿法会寄送供品并为达赖喇嘛祈福(此使团被称为洛恰/*llo-phyag*)。除了向其他喇嘛进献并未指明数量的礼物外,这个三年一次的使团还要向在拉萨的拉章(*Bla-brang*)强佐交纳 10 拖拉(*thur-zhos=tolas*,金属重量单位-译者)的黄金,10 两(*srangl*盎司)香水和 6 卷霍尔(*Hor/Moghul*)布匹,1 卷派答(*bab-sta*,?)布。在拉萨期间他们每天都会得到口粮供应。允许他们携带 200 驮货物和 25 匹用于乘骑的马,再加上个人的饮食起居物品。西藏方面应当给他们提供马匹作为交通乌拉(*vu-lag*/强制劳力)。阿里三围三个地区的税收留给竹钦活佛,但是拉萨政府更想自己掌控这个地区,于是将卫藏地区的三处领地授予竹钦活佛作为替换。这样,日土、古格等地被西藏兼并,表面上是为了给供灯和拉萨的新年祈愿法会提供资金<sup>[101]</sup>。

1685 年 4 月 21 日(西历 5 月 23 日)西藏的摄政任命行政长官(*rdzong-sdod*)到阿里各地方<sup>[102]</sup>。1687 年,在达拉喀建起了一座新寺院,在扎西岗建成一所密宗学校。托林寺仍然作为西藏西部的格鲁派中心,寺院被精心修缮,其主持直接从拉萨派遣<sup>[103]</sup>。

割让的领土还包括司丕底,1685 年曾委任一位宗堆(*rdzong-sdod*)到那里,1687 年做了替换<sup>[104]</sup>。但是随后这一职位就终止了,司丕底很快又回到松散的拉达克宗主之下,尽管拉萨仍然对这个小山谷

维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大概在此时,上库纳瓦(*Upper Kunawar*)割让给了巴沙尔王,该王在那场战争中曾经是西藏的盟友。这个王国的滋扰就此结束。

如上所述,这个条约签订于 1684 年春。外交关系很快得到修复,1684 年 10 月 13 日(西历 11 月 18 日)诺诺阿旺南杰(*No-no Ngag-dbang-rnam-rgyal*)在拉萨递交拉达克王德丹南杰的祈愿书<sup>[105]</sup>。

胜利将军噶丹次旺慢慢地返回了卫藏。1684 年 6 月 10 日(西历 7 月 21 日)他正式向班禅报告兼并了阿里<sup>[106]</sup>,并于 11 月 11 日(西历 12 月 17 日)回到拉萨,摄政与和硕特汗以盛大的欢庆仪式迎接他<sup>[107]</sup>。随后,他离开了,或许是去了准噶尔。他派出的信使于 1685 年底到达拉萨<sup>[108]</sup>。12 月 29 日(西历 1687 年 2 月 11 日)及随后的第 2 个月在西藏的首府为他举行了超度仪式<sup>[109]</sup>。

这两个条约彻底粉碎了拉达克的势力,削弱了王国的力量,剥夺了其多半领土,使它成为三等国家,从此一蹶不振。它的垮台绝非因为噶丹次旺的军事力量超强,他率领的部队并非势不可挡。真正的原因在于经济方面。很明显,拉达克的经济几度因为大兴土木、森格南杰及其继承者向当地和西藏寺院的巨额馈赠而损耗殆尽,而自 1639 至 1665 年间长期断绝与克什米尔的贸易往来,彻底毁了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拉达克过于虚弱以至无法抵抗两个邻国中的任何一个,遇到两国夹攻则被彻底摧毁。它作为喜马拉雅地区重要力量的角色从此永远结束了。此后的历史仅仅反映局部的利益。

除了这场战争,关于德勒南杰的唯一一条其他的信息就是他对达纳寺的保护和布施<sup>[110]</sup>。

德勒南杰妻子的名字我们无从知晓。他有四个或五个儿子,但是在各种写本的《拉达克王统史》中对他们名字的叫法有很大的分歧。只有对大儿子(尼玛南杰/*Nyi-ma-rnam-rgyal*)和二儿子(阿旺南杰/*Ngag-dbang-rnam-rgyal*)的名字没有异议。三儿子在四叶本(*Mss.B*)、贝杰(*dpal-rgyal*)本、大英博物馆本、及索南上师本中被称为旺秋南杰(*Dbang-phyug-rnam-rgyal*),但是在格尔甘的《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42 页被简称为德却(*De-chok*),在坎宁罕姆的《拉达克地理、统计与历史》330 页则称为德炯(*Bde-skyong*)。大英博物馆本插入了一个称为顿珠南杰(*Don-grub-rnam-rgyal*)的人,坎宁罕姆插入了一个称为却丹珠(*Chholtan-grub*)或却代顿珠(*Chho-dval-ton-grub*)的人,但未见于其他资料。最后一个儿子似乎较为确定:他的名字叫噶丹南杰(*Dgav-ldan-rnam-rgyal*),据格尔甘的《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记载他生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之后,只有坎宁罕姆将其出生地定在却丹(*chho-rtan*)。坎



宁罕姆似乎在这里错误地插入了一些后代王朝国王的名字。如果我们完全忽视了它,也忽略了大英博物馆本中的顿珠南杰,那么剩余的四个名字可能会被历史所接受。

德勒南杰死于1691年或之前,因为这年的6月28日(西历8月21日)诺诺伦珠(No-no Lhun-grub)带着金、银、布匹等来到拉萨参加拉达克赤巴(La-dvags khri-pa,不是国王!)德勒南杰的超度仪式。随后7月3日(西历8月26日)他为了同样的差事到扎什伦布寺<sup>[11]</sup>。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达仓热巴传》,42b。
- [2]《拉达克王统史》,40.7;《达仓热巴传》,41a-b,42b(日期存在一些疑问)。奇姆日寺院全称特确德钦林(the-g-mchog bde-chen gling)。
- [3]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82b,见《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文集》,大吉岭1973年重印。
- [4]《达仓热巴传》,43a-b;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87a。
- [5]《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132a。图齐《西藏画卷》第2卷,1949年,罗马,第256页。亦见艾哈迈德《17世纪的汉藏关系》,1970年,罗马,130n。
- [6]《达仓热巴传》,44b;《拉达克王统史》,40.16。
- [7]《达仓热巴传》,44b。U-éi或‘Ub-shi(地图中的Up-shi)在嘉(rgya)河和印度河的汇流处。曲雪(chu-shod)(地图中的chushot)在印度河左岸,在赤色(khrig-se)对岸附近。
- [8]这种对古格的三层分类法应当是指城市和村庄(bod)、牧区(vbrog)以及可耕植的谷地(rong)。见石泰安《西藏的文明》,1962年,巴黎,第83-84页。
- [9]《达仓热巴传》,45a;《拉达克王统史》,41.4-9。
- [10]《达仓热巴传》,46b;《拉达克王统史》,41.12-14。
- [11]《达仓热巴传》,47b。
- [12]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99a-b。
- [13]《达仓热巴传》,48b。为表示怀念立起一面很长的玛呢墙。《拉达克王统史》,41.14-15。
- [14]《达仓热巴传》,49a;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00a-102a。
- [15]《达仓热巴传》,51b。
- [16]《达仓热巴传》,53b。
- [17]《达仓热巴传》,53b-54a。
- [18]《达仓热巴传》,56b。
- [19]关于达仓热巴转世的寻访过程见《达仓热巴传》,53a-b,以及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02b。大约在1666年王德却南杰邀请他到桑噶,见《桑噶悉达阿旺次仁传(1657-1732)》(dbal ldan bla ma dam ba vkhrul zhig rin po che ngag dbang tshe ring gi nam thar kun tu bzang povi zlos gar yid kyi bcud len),12b。其他仅在赫尔密寺的祷文(gsol-vdebs)中提及他。
- [20]见上文43页注2。
- [21]《达仓热巴传》,51b。

- [22]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01a。
- [23]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01b。
- [24]《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传(1641-1717)》(rgyal dbang A dzi tendravi nam thar pa kun tu bzang povi yon tan gyi me long),65b-66a。
- [25]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02a。
- [26]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02a-103a。
- [27]达仓热巴曾给他寄去一些礼物。见《达仓热巴传》,47a、49a。在很晚的时候,《桑噶悉达阿旺次仁传》(102b)或许暗示他就是工布古杰活佛·觉次仁(kong-povi sku-skyes sprul-sku vbyor-tshe-ring),任国王德丹南杰的上师。
- [28]《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传(1641-1717)》,66b-67a;《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ka函,242b-243a。亦见《第一世班禅罗桑曲吉坚赞自传》,150a。
- [29]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1976年,新德里,文献2/kha。
- [30]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09b。《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ka函,313b、314a、315a。
- [31]《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传(1641-1717)》,75a-b。
- [32]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12b-113a。
- [33]《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ka函,349b;贡噶隆珠《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617-1676)》,113b-114a;《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传(1641-1717)》,86a。但是事件的具体情节并不清楚。
- [34]伯尼尔确定的时间1665年是错误的。见萨卡尔(J. N. Sarkar)《奥朗则布史》(History of Aurangzeb),第3卷,14及V,420。
- [35]伯尼尔《莫卧儿帝国旅行记》,第422-424页。
- [36]《阿拉姆基尔(即奥朗则布)本纪》(Ālamgīr-nāma),加尔各答,1868年,第923页;《贵人传》(Ma’āsir ul-Umarā)第二卷,加尔各答,1890年,第482-483页。萨卡尔《奥朗则布史》,第3卷,第18页。在该作品第5卷421页,给出的时间1666年是错误的。奥朗则布的统治年代始于赖丹月(Ramazān,即斋月——译者)第一天,那么其第8年应对应伊斯兰教1075-6年,即1665年3月到1666年3月。
- [37]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克什米尔史》(Tārīkh-i-Kashmīrī),手写本,138a。
- [38]坎宁汉姆《拉达克、自然、统计与历史》,伦敦,1854年,第35页。《阿拉姆基尔(即奥朗则布)本纪》数次提到他向莫卧儿宫廷呈送贡品。
- [39]维格尼《克什米尔、拉达克、伊斯卡杜等地旅行记》,第2卷,伦敦,1842年,第253页。
- [40]阿赫鲁瓦里亚(M. L. Ahluvalia)《拉达克与印度的关系》(Ladakh’s relations with India),《皇家历史档案委员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ssion),第33期(1958年),第2部分,第6-7页。
- [41]清真寺大门上的一块匾额中含有这个时间。波斯文本由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404页)提供。

- [42]阿赫鲁瓦里亚《拉达克与印度的关系》,第7页。
- [43]霍斯顿(H. Hosten)《弗朗西斯科·戈迪尼翁(Francisco Godinho)神父来自西藏西部的一封信(札布让,1626年8月16日)》,载《JPASB》第21期(1925年),第70页。
- [44]《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kha函,30b-31a。译文见艾哈迈德《1679-1684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年),340-361页。
- [45]《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kha函,82b。译文见艾哈迈德《1679-1684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年),343-344页。此文本的结尾部分似乎被删除了。我们通过F.57号碑文即德丹南杰时代最早的碑文之一而知道了诺诺杰德(No-no rgyal-lde)。
- [46]《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kha函,140a。这可能就是荣增活佛于1673年接见的同一个使团,见米旁珠居·雅佩旺布(mi-pham sgrub-brgyud yar-vphel dbang-po)《第二世德钦曲阔寺荣增贡噶隆珠续传》(yongs-vdzin dam pavi .....dal gtam gyi vphros brjod pa rab bdevi vbras bu mngon skyed ngo mtshar gru char),1973年,达吉岭,20a-b。
- [47]格尔甘的著作涉及了流传在萨布的传说,见《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398-400页。
- [48]格尔甘在《玛呢和著作汇编》中列出了跋文,即No.11和No.13。
- [49]《拉达克王统史》A1.19-27;有关释迦嘉措的记载见富兰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242.2-3。莫卧儿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踪迹。
- [50]有关释迦嘉措的记载见富兰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243.3-4。这一段文富兰克的翻译有误,其意应该是:“他把噶宗交回给洛沃,他为洛沃的外公和舅舅(mes-zhang)服务。当他镇压了达岭(da-ling)之后,岗日(冈底斯山)地区不再有盗贼之手(jag-tsho应该理解为byag-tshom)”。有关洛沃(glo-bo或blo-bo,木斯塘)参见图齐《两个科学探险队在尼泊尔考察的初步报告》,1956年,第8-19页。也见斯奈尔格罗夫《多波四个喇嘛》(Four Lamas of Dolpo),牛津,1970年,第一卷,第8-10页。
- [51]有关释迦嘉措的记载见富兰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243.4-6。
- [52]《达仓热巴传》,第44a。
- [53]见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资料2/ka。很清楚顿珠佩曾于1661年随大臣阿觉其古前往拉萨,见本著第62页。
- [54]朵喀巴·次仁旺杰(mdo-mkhar-ba tshe-ring-dbang-rgyal)《颇罗鼐传》(dpal mivi dbang povi rtogs brjod pa vjig rten kun tu dgav bavi gtam),16a。
- [55]他在已经引注的跋文n.10中出现过。
- [56]她出现在有关该王的一个碑文中(F.107)。
- [57]萨布一本著作的跋文中提到了她,见格尔甘《玛呢和著作目录》N.11。这次朝佛活动见《第二世班禅罗桑益西自传》(Shakyavi dge slong blo bzang ye shes kyi spyod tshul gsal bar ryed pa vod dkar can gyi phreng ba,西方学术界习惯于从班禅罗桑曲吉坚赞即从第四世开始计班禅世系,故计五世班禅为二世班禅,下同——译者),第154b。
- [58]见《桑噶悉达阿旺次仁传》,28b。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05页。
- [59]即已引征过的跋文,见格尔甘《玛呢和著作目录》N.10。
- [60]《达仓热巴传》,第48a。
- [61]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05页。坎宁罕姆《拉达克地理、统计与历史》,第330页。其中将此三人的名字拼写为Banchak, Jigbal, Thuptan。
- [62]根据坎宁罕姆《拉达克地理、统计与历史》(第330页),德丹南杰让位以支持其子,后隐居在“Stuklakte”,即达孜寺(stag-rtse),有关该寺见福兰克《印藏古物》第1卷,加而各达,1914年,第99页。
- [63]《芒域法王世系》(mang yul sa la spyod pavi chos rgyal gdung),《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载《第五世达赖喇嘛文集》cha函,179b。
- [64]波斯文见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454-455页。莫尔克罗夫特(W. Moorcroft)的英译见阿赫鲁瓦里亚(M. L. Ahluvalia)《拉达克与印度的关系》,第2部分,第7-8页:“阿乞巴特·马合木汗是德丹南杰因为要与莫卧儿签订条约而采用的称号(1683)”。
- [65]见F.60、61、65、107,以及一通在福兰克《印藏古物》第1卷第65页提到的在嘉地发现尚未刊布的碑文。
- [66]伯戴克《1681-1683年西藏、拉达克及莫卧儿战争》,1947年;艾哈迈德《1679-1684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年),340-361页。我们有关战争的资料有:《拉达克王统史》、释迦嘉措的记录,以及坎宁罕姆的著述等反映拉达克方面的资料;《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颇罗鼐传》等反映西藏方面的资料;所谓的南木嘉记录(Namgya document)等反映巴沙尔(Basgahr)方面的资料;穆罕默德·阿扎姆(Muhammad Azam)的《克什米尔史》(Tarikh-i-Kashmir)等反映莫卧儿方面的资料;以及非常简要提及此事的《第一代嘉曹阿旺丹增热杰传》(mtshungs med chos kyi rgyal po rje rin po chevi nmam par thar pa bskal bzang legs bris vdod pavi re skong dpag bsam gyi snye ma)等反映不丹方面的资料。
- [67]《颇罗鼐传》,11a-b。
- [68]《黄琉璃》,366b(376)。
- [69]《拉达克王统史》A2.1-2。新的译文见艾哈迈德《1679-1684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年),第351-352页。
- [70]《第一代嘉曹阿旺丹增热杰传》,98b-104a。亦见伯戴克《1650-1750年间的布不丹统治者》(The rulers of Bhutan c. 1650-1750),载《远东》(Oriens Extremus),19(1972),第208页。
- [71]《颇罗鼐传》,12a-13a。《第六世竹钦米旁旺布传》,115a。
- [72]《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Ga函,91a-93b。
- [73]《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Ga函,131a。译文见艾哈迈德《1679-1684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年),第345页。亦见《颇罗鼐传》,13b-14a。根据坎宁罕姆提供的资料,他的协助指挥官(fellow-commander)是罗桑喜饶(blo-bsang-shes-rab)。
- [74]《颇罗鼐传》,15a-16a。阿松是未来的“藏王”颇罗鼐·索南朵杰(Pho-lho-nas bsod-nams-stob-rgyas)的祖父。
- [75]伯戴克《1681-1683年西藏、拉达克及莫卧儿战争》,1947年,第175-176页。
- [76]《拉达克王统史》A2.16-17。
- [77]坎宁罕姆《拉达克地理、统计与历史》,第326-327页。该地在释迦嘉措的记录中称为热拉贝杰(ra-la dpal-rgyas),



见富兰克《印藏古物》第 2 卷,1926 年 243.6。在《拉达克王统史》中称夏玛顶(zhva-dmar-lding)见 42.5。

[78]《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Ga 函,168b。译文见艾哈迈德《1679-1684 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 年),第 346 页。

[79]《颇罗鼐传》,18a-19a。

[80]《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Ga 函,181a。

[81] 伯戴克《1681-1683 年西藏、拉达克及莫卧儿战争》,1947 年,第 180-181 页,在那里已引述了相关资料。

[82]《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Ga 函,199a、203a。

[83] 我们可以猜想他通过向拉萨寄送礼物来庆祝这一事件 4 月 20 日(西历 1681 年 6 月 6 日)拉萨收到该物品。

[84]《桑噶悉达阿旺次仁传》,36a-37b。有关因陀罗菩提的信息极缺。1655 年他仍在古格掌政,见《第二世德钦曲阁寺荣增贡噶隆珠自传》,103a。1682 年的事件最后一次提到他,可能此后不久便故去了。

[85] 迪特·舒(D.R. Schuh)《有关卫藏、拉达克和桑噶的文献与书信汇编》(*Urkunden und Sendschreiben aus Zentral-Tibet, Ladakh und Zaskar*) 圣奥古斯丁,1976 年,53 页。

[86]《桑噶悉达阿旺次仁传》,38b。

[87]《桑噶悉达阿旺次仁传》,40b。

[88] 迪特·舒,53 页.LXXX。

[89]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3 kha。我们还可提及后来的一份文献(3 ka),即德勒南杰于 1690 年 7 月在巴郭颁发给列城的朵噶且·次仁伦珠(*do-ga-che tshe-ring-lhun-grub*)的免税文告,以奖励他圆满的服务。

[90]《拉达克王统史》,43.6-10。最新的译文见艾哈迈德《1679-1684 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 年),第 355-356 页。

[91] 拉达克的钱币多数(不是全部)是在克什米尔铸造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现 1771 年之前的货币。见潘尼什(C. K. Panish)《拉达克的钱币》(*the coinage of Ladakh*) 载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Museum Notes*,16 (1970),第 185-188 页。但是该文的历史背景几乎完全错误。

[92]《克什米尔史》,第 147 页。《阿拉姆基尔大事记》(*Maāsir-i-‘Ālamgīrī*) 第 236 页。

[93] 有关莫卧儿的条约见伯戴克《1681-1683 年西藏、拉达克及莫卧儿战争》,1947 年,第 192-193 页。在战争期间菲戴汗以皇帝的名义,给喇嘛玉如(lamayuru)的僧众颁发文告,禁止骚扰他们的宗教仪式和侵占他们的土地。见莫尔克罗夫特(W. Moorcroft)《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anjab*),1841 年伦敦出版,1971 年新德里重印,第 2 卷,第 14 页。

[94] 米尔·伊萨特·乌拉赫(Mir Izzet Ullah)《外喜马拉雅旅行记》(*Travel beyond the Himalayas*) 载 *JRAS*,7(1843),第 288 页。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第 347 页。

[95] 霍齐森、沃格尔《旁遮普山区邦国史》,第二卷,第 462

页。

[96]坎宁罕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第 328 页。

[97]《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载《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第 73b-74a。译文见艾哈迈德《1679-1684 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 (1968 年),第 346-347 页。尽管给出这段信息的时间是在 1684 年 11 月 20 日,但事实上应该是此前的事件。

[98]《第六世竹钦米旁旺布传》,109b-110b。

[99]《第六世竹钦米旁旺布传》,114b-117b。

[100] 对竹钦活佛的尊崇见 F. 108。一份尚未刊布的在齐姆日寺前大玛呢经墙上的题文以及另外在嘉地玛尼经墙上的两块石头上的题文都颂扬了他和阿旺措吉多杰。后者已由福兰克在《印藏古物》第一卷(63-64 页)中做过描述,是两首题文分别在两面经墙上。但是 图齐教授慷慨地借给我的照片显示是相同的题文在两个石头上,位置是同一面经墙一个在另一个上方。

[101]《拉达克王统史》,42.13-43.6。我认可艾哈迈德在《1679-1684 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 年),第 352-355 页)中的新译文。关于对竹钦活佛的允诺见《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nga 函,295a-b。

[102]《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104b。

[103]《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226a、231a。亦见 Nga 函,277a-b。

[104]《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104b、218b。

[105]《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73b-75a。译文见艾哈迈德在《1679-1684 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 (1968 年),第 346-347 页。阿旺南杰更为准确的名字是阿旺措南杰(Ngag-dbang-phun-tshogs-rnam-rgyal),是德丹南杰的儿子(艾哈迈德将 *bu* 误读为 *khu*) 我们即将谈到他。

[106]《第二世班禅罗桑意希自传》,89a。

[107]《颇罗鼐传》,22b-25a。《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78b。译文见艾哈迈德在《1679-1684 年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东方与西方》,18(1968 年),第 347 页。

[108]《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141b。

[109]《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a 函,199b、209b。

[110] 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442 页。

[111]《第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五世达赖喇嘛全集》,Cha 函,25a。《第二世班禅罗桑意希自传》,121a。

[审稿 索南才让]

[校对 梁成秀]

## On Tibetan Work'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Wang Yue & Wei D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

**Abstract:** The cold war ended in 1990s and bipolar structure was broken, then China became the aim of containing and splitting by western countries. Backed up by western anti-China's forces, Dalai clique constantly created disturbances, attempting to separate Tibet from China. To fight against this challenge effective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important statement of "three concerned with" and "two mustn't", aiming to enhance the realiza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work, urge all the Party and Tibetan officials to fulfill their duties seriously. Thus can we realize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ibet, maintain the unity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three concerned with"; "two mustn't"; Tibetan work; strategic position

## The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under Special Policies in Tibet: Accomplishment, Measure and Experience

Zhu Yuf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Shanxi, Xianyang, 712082)

**Abstract:** Since democratic reform especially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in Tibet has got great achievement, the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gets a common praise because it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have taken a series of special and effective measure and policy for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in Tibet and provided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After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alf a century, fundamental experiences are taking shape gradually, depending on which, the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in Tibet would scale a new height, and finally embark on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Tibet; anti-poverty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measure; experience

## Kingdom Ladakh: 950--1842A.D.(5)

--Decline of Kingdom Ladakh

(Italian) Luciano Petech

Translated by Zhaluo, Revised by Peng Zhiy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100081)

**Abstract:** In late 17th century, the Kingdom Ladakh was on the decline under both the attacks of Turks from Kashgar and the Mongolian-Tibetan army, and ended its role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Himalayas.

**Key Words:** Ladakh; Mogul Empire; Tibet; conflict